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感知融合研究

——基于云南移民点的调查¹

史梦薇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易地扶贫搬迁是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有效举措之一，如何使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成败的关键所在，而这与移民的感知融合密切相关。云南省大理州和芒市五个村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感知融合程度比较高。其中，女性的感知融合程度高于男性；搬迁距离近的移民，其感知融合要高于搬迁远的移民。究其原因，相对经济情况、日常生活和生活水平的变化程度、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程度、对当地居民与政府的态度感知，这四类因素是影响移民感知融合的重要方面。最后，探讨了提高移民感知融合的路径。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感知融合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8)03-0156-05

大量的移民在政府的组织下迁移到新的居住点，大规模的移民既对当地的经济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也对迁移群体带来诸多社会融合问题。移民的社会融合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原有的相关社会融合研究把迁入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作为参照物，假定只有移民接受迁入地居民的行为习惯等才算是社会融合。但是行为习惯特别是风俗习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不会短时间内根本改变。即使移民仍然保留着原来的生活习惯和社会联系，也并不等同于没有发生社会融合^[1]。因此，相对于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社会交往融合等外显融合方式，心理融合更加处于核心地位。

感知融合是心理融合测量的重要工具。博伦和霍伊尔认为，感知融合包括个体在某一群体中的归属感以及与作为该群体成员的精神感受^[2]。感知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移民与原居民两个群体之间相互认同、彼此接受的意愿，对搬迁移民如何能够“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感知融合为基础，通过对云南省两市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聚居点一大理州、芒市几个移民村进行调查，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感知融合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索提高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感知融合的途径。

一、移民感知融合的衡量指标

感知融合有许多相近的概念，例如凝聚力、认同感等等。根据博伦和霍伊尔的定义，感知融合囊括了归属感和满足感两个维度。基于此，笔者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感知融合是一种主观心理意愿，包括移民对迁入地的归属感和在迁入地生活的满意程度。对迁入地的归属感包括了三个命题：“认为自己属于这里”；“感觉自己就是这里的主人”；“非常愿意居住在这里”。满意程度也包括了三个命题：“对目前的居住状态感到满意”；“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如果重新决定是否

¹【收稿日期】：2017-06-15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南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14ASH010）。

【作者简介】：史梦薇，女，贵州师范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社会认识与社会认同。

搬迁，基本不会改变主意”。这六道题目分别赋予“完全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同意、完全不同意”这五个等级，分别记为5分、4分、3分、2分、1分。归属感和满意程度分别将对应的三道题得分的均值，作为各自的测量值。

社会融合实质上是移民与迁入地居民互动的一个过程，对于迁入的移民来说，社会融合指的是学习、适应新的环境和知识，形成对迁入地的归属和认同的过程；对于迁入地来说，社会融合就是当地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风俗习惯等方面对移民的输入过程^[2]。从移民的角度来看，社会融合就是以归属感和认同感为主的感知融合，因此，影响社会融合的因素也是影响感知融合的因素。已有文献中，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一般可分为个体因素和群体性因素两种。个体性因素包括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态等因素；群体性因素包括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态度（心理）因素、社会支持网络等等。

首先，将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个体因素作为分析社会融合差异的分类变量，包括：性别、月收入、搬迁时间、安置点的位置（村寨、镇/街道、县城）、安置点的性质（工业园区、农业园区、旅游景区、其他）、搬迁方式（整组搬迁、集中安置；整组搬迁、分散安置；部分搬迁、集中安置；部分搬迁、分散安置；自发搬迁、自主安置；其他）、移民的家庭结构（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大家庭、隔代家庭、单亲家庭、其他）。之所以不作为影响因素，原因有二：其一，并不是每个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合度在上述因素中都呈现显著差异；其二，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搬迁方式的类型变量，更适宜整理和分析有关人口现象的数量资料。

其次，把经济因素、日常生活因素、社会交往因素和态度感知因素作为潜在影响因素。具体来说，包括了代表有关经济需要的经济融合；包含了认知、行为、风俗习惯等日常生活融合，移民与原居民互动的社会交往融合，以及代表着移民主观融入感受的态度感知。经济状况是影响移民融合程度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是首选的影响因素。相比文化因素而言，日常生活的变化更能反应移民的融合程度。本文的调查点多为少数民族移民搬迁地，总体来看，少数民族文化氛围并没有随着移民搬迁而呈现出太大的变化，变化大的是少数民族移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内容，所以选择日常生活的变化程度作为第二个影响因素。社会交往作为社会支持网络要素的重要方面，当作第三个影响因素。前三个都是移民的客观条件，而搬迁地居民和政府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接纳意愿，往往会影响移民的融入意愿，因此第四个影响因素为迁入地居民和政府的态度感知。

二、移民感知融合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选取了云南大理州的茶山村、边江村和岔花村，德宏州芒市的江连新村以及和谐村进行调查，发放问卷81份，回收问卷81份。民族成分以白族、景颇族、德昂族、汉族为主，年龄主要分布在18-59岁，男性41人，女性40人。总的来说，这四个易地扶贫搬迁村村民的感知融合程度较高。为了全面考察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感知融合程度，构建了两个维度、六个指标，即被调查者在5点量表上的平均数作为衡量感知融合的指标。但是仅使用平均数会掩盖融合感知的差异性。为了更好地揭示感知融合的程度，将原始的5个问卷选项进行重新归类，把“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归为融合感知度低；将“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归为融合感知度中等；将“同意”、“完全同意”归为融合感知度高。

（一）移民感知融合现状。

总体来说，无论是男性移民还是女性移民，都有着较高的感知融合度（见表1）

表1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感知融合程度

调查地点		感知融合（频次）		合计 （频次）	感知融合 度均值
		中度	高度		
大理漕建镇 茶山村	男	4	6	10	3.5
	女	0	8	8	3.9

	合计	4	14	18	3.7
大理民建乡 边江村	男	2	6	8	3.4
	女	7	0	7	3.5
	合计	9	6	15	3.4
大理民建乡 岔花村	男	1	7	8	3.6
	女	3	7	10	3.8
	合计	4	14	18	3.7
德宏芒市江 连新村	男	2	4	6	3.5
	女	4	4	8	3.6
	合计	6	8	14	3.5
德宏芒市 和谐村	男	4	5	9	3.6
	女	2	5	7	3.8
	合计	6	10	16	3.7

融合感知得分 1-2 分（即融合感知低）0 人；融合感知得分 3 分（即融合感知中）23 人；融合感知得分 4-5 分（即融合感知高）58 人。感知融合高的个体占调查总人数的 72%，可见，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对于迁入地有着较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究其原因，是因为迁入地比原居住地更加有利于移民的日常生活；搬迁地大多靠近集贸市场或是交通要道，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在原居地上学难、就医难、出行难等问题。

另外，从感知融合的性别差异来看，女性移民的感知融合程度要略高于男性移民，女性融合感知度平均数高出 0.1-0.4（见表 1）。相比男性，女性更加温柔、细腻、更加善解人意。这种性别上的差异促使女性有着更高的情绪智力，即更容易在理解自己和他人情绪基础之上解决问题和调节行为。因此，女性对新环境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对迁入地有着更高的满意度和归属感。

除了性别差异外，移民的感知融合也因搬迁距离而异（见表 2）。50 公里是感知融合变化的一个分界点。搬迁距离 50 公里以内的移民有着较高的感知融合程度，感知融合度的平均值在 3.5-4 之间；而搬迁距离大于 50 公里的移民，其感知融合程度在 3-3.5 之间。搬迁距离越近，移民的感知融合程度越高，反之越低。易地扶贫搬迁强调的是把群众迁移到更适宜居住的地方，并不排除本村、本乡范围。搬迁距离近，甚至搬迁地就在本乡、本村的移民，生活环境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就不需要适应环境，感知融合度自然要高。而搬迁距离在 50 公里以上的，一般而言都会搬出本乡，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其归属感和满意度要比近距离搬迁的移民要低。

表 2 搬迁时间、距离与感知融合

搬迁时间	搬迁距离	融合（频次）		合计 （频次）	感知融合 度均值
		中度	高度		
5 年以内	5 公里以内	5	8	13	3.7
	5-10 公里	5	13	18	3.7
	10-50 公里	4	4	8	3.5
	50 公里以上	1	0	1	3
	合计	15	25	40	3.5
5-10 年	5 公里以内	1	4	5	3.7
	5-10 公里	3	5	8	3.6
	10-50 公里	1	1	2	3.5

	合计	5	10	15	3.6
11-15年	5公里以内	2	2	4	3.6
	5-10公里	0	1	1	3.7
	10-50公里	0	1	1	3.4
	50公里以上	1	1	2	3.5
	合计	3	5	8	3.6
15年以上	5公里以内	2	6	8	3.6
	5-10公里	2	4	6	3.7
	10-50公里	0	1	1	3.7
	50公里以上	2	1	3	3.4
	合计	6	12	18	3.6

不同的移民方式对移民的感知融合也有一定的影响（见表3）。整组搬迁、整组（自然村）集中安置的移民感知融合最高，接下来依次是部分搬迁、集中安置；部分搬迁、分散安置；整组搬迁、分散安置；整组搬迁、分散安置；自发搬迁、自主安置。可见，集中安置移民的感知融合度要高于分散安置的移民。移民在原居住地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劳务、人力、资金等资源的互利互惠，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的社会资本。

表3 搬迁方式与感知融合

移民方式	样本数	感知融合度均值
整组（自然村）搬迁、整组（自然村）集中安置	22	3.8
整组（自然村）搬迁、分散安置	5	3.5
部分搬迁、集中安置	45	3.7
部分搬迁、分散安置	4	3.6
自发搬迁、自主安置	5	3.2
总计	81	3.7

整组搬迁、集中安置的移民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社会网络，避免了这一部分社会资本的流失。相反，那些部分搬迁或分散安置的移民，迁移将会使上述社会资本受到较为严重的损失，其感知融合度比较而言就要低些。而移民家庭结构、文化程度、年龄、民族和婚姻状况的不同并没有导致在感知融合上的显著差异。

（二）移民感知融合的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探讨移民感知融合的影响因素，本文根据已有研究结果把影响因素分为四个部分：经济因素；日常生活因素；社会交往以及态度感知因素。

1. 经济因素。可分解为：搬迁前后移民收入的比较；搬迁后的家庭收入与一般本地家庭的收入差距。这两个指标分别赋予“高很多、高一些、差不多、低一些、低很多”，分别记1分、2分、3分、4分、5分。以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感知融合度为因变量，搬迁前后收入变化和目前家庭收入与本地家庭的比较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分析。

变量“搬迁前后的收入变化”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P值大于0.05（见表4，下同），故此项并不能引入模型。而变量“目前家庭收入水平与一般本地居民比较”对移民的感知融合有着显著的影响，即移民的收入水平比搬迁地居民高的，其感知融合也高，反之就低。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影响感知融合，而相对收入差距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感知融合度。

表4 移民感知融合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系数）

	M ₁	M ₂	M ₃	M ₄
	经济水平	日常生活	社会交往	态度感知
（常量）	4.056**			
收入水平与原居民比较	-0.136**			
搬迁前后移民收入的变化	0.037			
（常量）		3.465**		
迁后生活变化		0.158**		
搬迁前后，生活水平变化		-0.157**		
（常量）			3.966**	
迁后与本地人的来往			-0.277**	
迁后交际范围变化			-0.087	
（常量）				4.651**
政府的移民态度				-0.295**
原住民的移民态度				-0.190**
R ²	0.027	0.072	0.059	0.22
调整后 R ²	0.017	0.062	0.052	0.2

相对收入水平比绝对经济收入更能影响到移民的感知融合，这样的结果与社会比较有关。获得认同感的途径有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与周围人比较而获得^[4]。个体的自我评价受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从本质上说，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直接左右着移民的自我评价，乃至感知融合程度。当移民面对上行比较信息（即比自己收入高）会降低自我评价水平，从而感知融合程度较低；当移民面对下行比较信息（即比自己收入低）会提高自我评价水平，获得较高的感知融合度。

2. 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指标也分为两个方面：搬迁后日常生活变化程度；搬迁后生活水平的变化。前一道题赋予“变化很大、变化较大、变化较小、基本无变化、完全没变化”五个等级。分别计1分、2分、3分、4分、5分。搬迁后的生活水平变化，赋予“提高很多、略有上升、没变化、略有下降、下降很多”五个等级，分别记1分、2分、3分、4分、5分。

结果显示，搬迁后日常生活变化与感知融合关系呈现正相关，且非常显著（显著水平为0.01），表明在迁入地日常生活变化越小，感知融合程度就越高；搬迁后生活水平提升越高，感知融合度就越高。

搬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移民与原居地生活共同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伦理道德、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心理情感等，从而深刻地体验到“断裂”感^[5]。虽然这种“断裂”从长远看是必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将在一段时期内使移民感受到搬迁后的阵痛。搬迁后的日常生活变化越大，移民的“断裂”感越强，感知融合度就越低。而生活水平直接关系到移民感知融合的高低，生活水平不仅包括实际的经济收入，还包括了劳动的社会条件、社会服务的发达程度、闲暇时间的占有量和结构、卫生保健和教育普及程度等等。由经济因素的分析可知，纯粹经济收入对移民的感知融合影响不大，而经济收入加上生活、社会保障组成的生活水平确能影响移民的融合度。可见，移民对出行、教育、医疗、居住条件等有了更高的要求。更加便捷、优质的生活更能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合。

3. 社会交往。由两道题目来测量：是否与本地人有来往；搬迁后，移民的交往范围变化程度。前一道题赋予“频繁、经常、有时、很少、无”五个等级。分别计1分、2分、3分、4分、5分。搬迁后移民的交往范围变化程度，赋予“扩大很多、略有扩大、没变化、18各有缩小、缩小很多”五个等级，分另IJ记1分、2分、3分、4分、5分。

变量“搬迁后，移民的交往范围变化程度”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P值大于0.05，所以，这一项并不能引入模型。而变量“是否与本地人有来往”对移民的感知融合影响显著，即移民与当地居民交往越频繁，其感知融合越高，反之就低。可见，搬迁后交往范围的大小并不能影响移民的感知融合，而与当地人的交往程度才是社会交往层面影响感知融合的重要因素。

社会交往与心理融合水平密切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移民的感知融合水平。特别是迁入地原居民，比任何群体都能显著影响移民的感知融合。移民与原居民的社会交往是移民与其建立一定的联系，接受迁入地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并建立新的社会网络的过程。实质上，这一过程就是移民对迁入地的文化适应和行为适应。社会交往程度越深，移民的认同和归属感就越强。

4. 态度感知。包含移民感知本地人对其态度和移民对政府态度的感知。前者赋予“非常友好、友好、一般、有点歧视、非常歧视”，分别记1分、2分、3分、4分、5分。后者赋予“非常关心、比较关心、一般、不太关心、完全不关心”，分别记1分、2分、3分、4分、5分。

两变量均显著影响着移民的感知融合程度。移民对当地居民对其态度的感知越积极，其感知融合度越高；感知到政府更多的关心，也会促进移民感知融合的提升。

移民的态度感知实际上就是体验到的情感上的获得感，也就是个体在交往过程中感受到的被支持、被尊重，从而产生的情感体验。社会融合是移民对当地环境的适应及融入的过程。一般来说，社会支持会提高个体的社会融入程度。而迁入地居民及政府对移民的积极态度，使移民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这些积极的情感体验则是移民拥有的主观社会支持之一。良好的社会支持会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合，增强移民的感知融合程度。

三、移民感知融合提升的路径

易地扶贫搬迁并不是简单的人口空间移动，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提高移民对迁入地的认同和归属感，是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至关重要的环节。原来社会融入研究大多强调移民对迁入地的适应，重点放在移民的外部条件上。但是，分析结果表明，主观收入水平、与搬迁地居民交往的程度与态度感知，都对感知融合有影响，这意味着心理层面的因素对社会融合的解程度增强。而生活水平对感知融合的影响，则说明出行、上学、看病、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实际问题的解决更能促进移民安居乐业。以上种种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已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未来的关注点应该更多转向心理、人际关系和行为习惯等方面，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物质方面^[5]。

首先，应在切实提高移民家庭收入的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和保障的均等化，减少各方面由于社会比较而产生的攀比效应。迁移前，移民一般居住在自然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除去外出打工，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原有土地的广种薄收。这种“靠天吃饭”的日子必然会导致贫困。而搬迁到生活方便的新居住地，因为生活环境、生产条件的变化，大多数移民与原居民的经济收入有较大的差距，这就会导致移民对自身经济地位较低的评价。而经济地位的低评价又降低了移民的感知融合水平。由此可见，贫困不仅降低了移民的生活水平，还导致了攀比效应，即同一刺激因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感觉落差的心理现象。较低经济地位会使移民产生攀比效应，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不均等同样也会产生攀比效应。因此，提高移民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是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的必要条件^[6]。

增加移民经济收入仅靠安置补偿是不够的，政府还应该加强帮扶和技能培训。开展群众性的帮扶工作，从村到镇再到县，

最终形成多层次的帮扶体系。对特别贫困的移民要予以重点关注。根据迁移地和移民的实际情况，有计划的开展技能培训，推广适合移民的生产经营项目，增强移民稳定、可持续的生计能力，授之以渔。另外，上学、就医、出行等涉及移民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必须落到实处。让移民既能感到搬迁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能生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能够享受公平的同等待遇。

其次，帮助移民重建生活共同体，加强移民与原居民在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和心理情感等方面的联系，增加移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搬迁后，移民的原有生活共同体遭到破坏，原来的生活习惯、精神诉求、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网络都会随之消失。这样，维系移民原来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要素逐渐消解。要想“稳得住”，除了增加经济收入、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之外，还要重塑移民新的生活共同体，帮助他们建立对迁入地的心理感情。

易地扶贫搬迁方式大部分以整组搬迁、集中安置为主，这样的安置方式一方面使得移民保持了原有的社会支持和交往网络，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移民之间共同的生活方式、熟悉程度，对移民新生活环境的适应有着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安置方式有可能导致移民社会交往的“内卷化”，即移民的社会交往局限在移民群体内部，成为群外交往的壁垒和障碍，出现社会交往的“趋同性”。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移民的社会融合。重建生活共同体，就是要打破这种同质性群体容易产生的群体内吸引，群体外排斥的现象。再通过广泛的社区参与，积极促进移民与原居民的交流互动，融为一体。

最后，关心移民的日常生活点滴，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让移民产生被尊重、被支持的积极情感体验。移民对政府的态度感知关系到移民的感知融合程度，感知到政府的关心，移民的感知融合程度就高，反之则低。加强政府与移民之间的沟通渠道，在规划和实施安置时，提高移民的参与程度。在日常生活中，要深入到移民中，联系移民，嘘寒问暖，积极解决移民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让移民感受到政府的关心。

[参考文献]:

[1]蔡禾,曹志刚.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2]Kenneth A. Bollen, Rick H. Hoyle. Perceived Cohes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J]. Social Forces, 1990(2).

[3]李振刚.社会融合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14(3).

[4]邢淑芬,俞国良.社会比较:对比效应还是同化效应?[J].心理科学进展,2006(6).

[5]周永康.生命历程与日常生活:大流动时代的乡村家庭与个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6]潘泽泉,林停捧.劳动时间、社会交往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5(3).